

經濟成長、所得重分配與人民幸福

經濟成長不必然增進幸福，文獻上稱為伊斯特林矛盾。這項矛盾聲稱雖然國內橫斷面的所得高低與幸福呈正相關，但在時間序列上，一國的實質所得卻與幸福不太相關，跨國間的所得與幸福相關性也不高。造成這項矛盾的原因是所得墊高物質欲望及相互比較。所得重分配是否提高平均幸福，也須視絕對所得及相對所得的效果而定。

陶宏麟（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

壹、經濟成長與幸福

早期經濟學家總以為要提高人民的福祉就是需要不停地追求經濟成長，許多政府的執政目標也都設定為追求國家的經濟成長。臺灣至目前為止，似乎還是停留在這樣的思維，這也是為什麼每年，甚至每季的經濟成長數據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也常被用來做為評判政府施政的成敗。

一、經濟成長的迷思－伊斯特林矛盾

對經濟發展已達一定程度的國家而言，經濟成長等同人民福祉很可能只是一項迷思。40年前 Easterlin（1974）發現一些有趣卻又矛盾的現象，即同一國內的個人所得高低會與幸福呈正相關，有錢人比貧窮人覺得幸福，但同一國家的實質所得雖然不斷成長，幸福卻未必跟著提升。他也發現跨國間的平均所得差異與跨國間的平均幸福關係不大。20年後，Easterlin（1995）進一步以更豐富的資料來強調並驗證他在1974年研究的主張，他舉

日本戰後的30年發展為例，1987年日本的每人實質所得是1958年的5倍，家庭擁有汽車的比例由1958年的1%，上升至1987年的60%，1987年日本人的物質生活顯然比30年前好太多。然而30年間，日本的平均生活滿意（mean satisfaction）幾乎是在一條水平線的上下移動，物質生活的提升並未同時提升人民的幸福。Easterlin（1995）這篇研究所列的國家，如丹麥、英國、比利時、愛爾蘭、德國與法國等都有類似的現象，即所得雖

論述》專論 · 評述

成長，人民幸福感卻不太變動，其中英國、比利時與愛爾蘭甚至呈現平均幸福下降的情況。

Easterlin (1974; 1995) 的這些研究有三項主要的結論：第一、同一時點上，同一國人民間的所得差異會與幸福有關，所得越高，幸福越高。也就是橫斷面資料上，不同人的幸福會與他們所得高低有關；第二、一國時間序列上的實質個人所得高低與該國的平均幸福變動關係不大；第三、橫斷面各國的實質所得也與該國的平均幸福關係不大，這就像近來常提到的國家一不丹，所得雖不高，幸福感卻較高。這裡利用 Clark, et. al. (2008a) 的圖來解釋 Easterlin 的前兩項結論，當 A 國的整體所得達至某水準後，整體所得與幸福幾成水平線關係，也是上面的結論二。A 國三個時點上國內個人高低所得與幸福的關係，所得越高者，幸福越高，也是上面的結論一。注意個人所得高低與幸福的關係大於整體所得與幸福的關係，而且整體所得越低（低所得期），個人所得高低與幸福的關係越大（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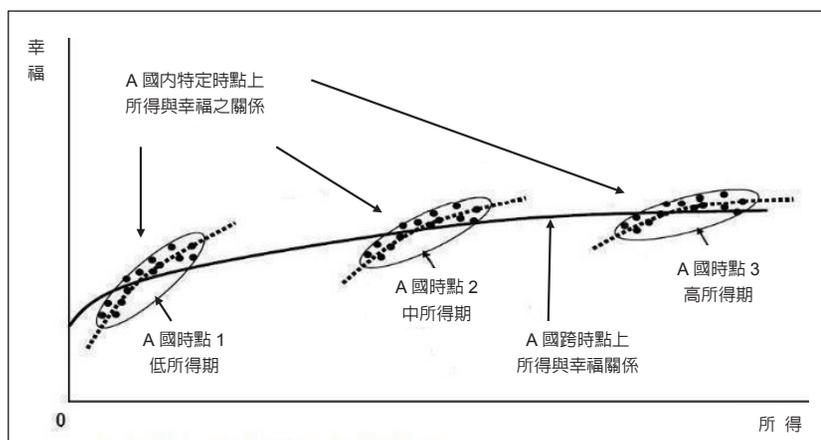
之後的幸福研究，就將 Easterlin 的這些發現統稱為伊斯特林矛盾，相關研究在經濟文獻中有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僅探討伊斯特林矛盾發生的成因 (Easterlin, 2001; Di Tella and MacCulloch, 2006)，更有使用幸福研究來評估失業與通膨何者對人民的幸福造成較大損失 (Di Tella, MacCulloch, Oswald, 2001)、婚姻價值的估計 (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4)、機場噪音帶來的損失 (Van Praag, Bernard, and Baarsma, 2005)，幸福本身不僅被當成研究對象，也被當成估計工具，估計人生內外重大事件的幸福獲得或損失的金錢價值。

二、伊斯特林矛盾發生的原因

(一) 所得墊高物質欲望

Easterlin (2001) 利用心理適應 (adaptation) 來解釋這項矛盾，所得提高後，生活物質更為豐裕，幸福感或許會短暫上升，但隨著人們逐漸適應了新增的物質，卻也墊高物質欲望 (aspiration)，幸福感又恢復原狀。幸福感要再上升，需有更高的物質滿足，不幸的是，這又再陷入心理適應與物質欲望墊高的輪迴陷阱中，導致長期觀察的所得與幸福關係為平坦線。「墊高物質欲望」又被某些經濟學

圖 1 縱斷面與橫斷面的所得與幸福關係



資料來源：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者稱為偏好漂移 (preference drift) (van Herwaarden et al., 1997)。這種物質增進幸福的效果究竟可持續多久，就一定得用個人追蹤資料 (panel data) 才有可能得知，Di Tella et. al. (2010) 利用德國的追蹤資料，發現所得對幸福的效果在 4 年後就消磨殆盡¹。

(二) 相對所得

發生伊斯特林矛盾的另一項原因，是所得會影響幸福，主要並非透過絕對所得 (absolute income)，而是透過相對所得 (relative income)，也就是透過與他人的比較而產生，有些經濟學家將其稱為偏好的相依 (interdependence of preference) (Ferrer-i-Carbonell, 2005)。在物質已足夠豐富的經濟社會，經濟成長帶動大部分人的所得提高，自己所得增加，別人也增加，自己的物質沒有相對較好，幸福感因而也未提升。舉例來說，經濟成長前，你每天騎機車上下班，隔壁鄰居則開 Toyota 上下

班，你的鄰居可能比你快樂，因為他覺得代步工具比你好。經濟成長後，你變富有了，也買了輛 Toyota，很得意的開出家門，卻發現隔壁開出來的不再是 Toyota，而是 BMW。頓時，你的幸福感再被打回原形，你的鄰居可能也未因 BMW 而更快樂，因他發現你生活狀況也變佳了。可以想像，在所得較低的階段，絕對所得的影響較大，這是因為絕對所得增加，代表物質的增加，生存條件更佳；在所得較高階段，絕對所得增加已不影響生存條件，此時相對所得對幸福的影響較大 (McBride, 2001)，換言之，高所得下的經濟成長對幸福增進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增加的所得在「比較」效果下，很多都消失了。

基於伊斯特林矛盾，經濟成長對已開發國家幸福的增進有限，也就是經濟成長對增進福利是會有「磨損」的，例如 Van Herwaarden et al. (1977) 估計 60% 的經濟成長因物質欲望墊高而消失，如果再考慮因

相互比較所造成的幸福損失，人們會對經濟成長「無感」就一點也不意外了。就臺灣自己的經驗來說，現在的中壯年大部分都在物質不豐裕的環境下成長，也歷經臺灣經濟最迅速成長的階段，但很多人可能並不覺得當下比以前幸福。有趣的是，經濟發展達一定階段後，人們會對經濟成長「無感」，但對經濟衰退卻很「有感」 (Layard et. al., 2008)。當下歐債諸國的人民反應就是最佳的實例。而且研究發現失業造成的幸福損失是最不易恢復原狀的 (Lucas et. al., 2004; Clark et. al., 2008b)。這也說明了執政者的困境，成功帶起經濟成長不必然得到人民的青睞，但若無法挽回經濟衰退，就會遭到人民的唾棄。

三、反對伊斯特林矛盾的聲音

並非所有的經濟研究都支持伊斯特林矛盾，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 以更多的跨國資料庫檢驗經濟成長與幸福的關係，發現兩者關係為正，是近年來以最嚴謹的研究對伊



斯特林矛盾的挑戰。Easterlin et. al. (2010) 也對這篇研究提出反駁，他認為 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 只是在檢驗「短期」(5 年內) 的幸福，短期的幸福是會隨景氣同向反應。他接著說若資料中去除兩個極端值國家：匈牙利(低經濟成長且生活滿意下降) 與南韓(高經濟成長且生活滿意高成長)，所得與幸福即無顯著正相關。

Powdthavee (2010) 是另一篇不認為所得與幸福無關的研究，他認為一般所得對幸福影響的研究都是採用最小平方方法估計，可能低估所得的效果，除了所得衡量誤差造成的效果減弱誤差 (attenuation bias) 外，他也認為所得高者通常工時長或與家人團聚時間短，這些都會降低幸福，因而低估所得對幸福的影響。不僅如此，他甚至認為物質墊高欲望的速度在分析中應該被控制，否則所得對幸福的效果也被低估。因此，他認為應該使用工具變數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來分析所得對幸福的效果，結果顯示使用工具變數的估計結

果明顯較最小平方方法的估計大。Powdthavee (2010) 想估計的是非常純淨的所得效果，所謂「純淨」，是指其中不包含為賺取所得而付出的痛苦(如工作壓力與失去親密的家庭關係等)，他所要求的「純淨」甚至超越文獻以中樂透來研究所得效果。中樂透雖排除了賺取所得而付出的痛苦，但仍無法排除物質墊高欲望的影響。想想看，這樣的所得效果如同人們揀到從天上掉下來的一筆錢，而且規定這筆錢不能墊高這些人的欲望，只是這麼「純淨」的所得對幸福影響的效果究竟是不是人們想探究所得效果的初衷？總之，雖然伊斯特林矛盾被大部分人接受，但並非沒有質疑的聲音。

貳、所得重分配與幸福

如果所得對幸福的影響僅單方面來自絕對所得，單從「邊際效用遞減律」，就會知道對富人課重稅，再補貼予窮人的所得重分配是可提高社會的平均幸福，這也許能解釋為什麼高稅制的北歐國家，不但所得分配較平均，平均幸福也一直

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區。不過，如果相對所得也會影響幸福，所得重分配如何提高整體幸福就是項相當複雜的問題。例如我們將最高所得組每人課 1 萬元的稅分配給最低所得組的每個人(設兩組人數都一樣)，在「絕對所得」影響幸福的層面上，因富有者損失的幸福低於貧窮者增加的幸福，整體的幸福會增加。但若考慮「相對所得」影響幸福的層面，情況就比較複雜，因這牽涉到人們究竟在跟誰比較。

在相對所得對幸福影響的文獻中，最關鍵的部分是比較對象 (reference group) 的選擇，大部分的資料並不會問受訪者是在跟誰比較，或誰的生活物質會影響自己的感受。比較對象的選擇大多是研究者主觀的認定，最常用的是選背景相似者(如相同性別、教育程度、行職業、居住在鄰近等) 做為比較對象。如果這些背景相似者都在同一組所得中，因同一組成員的所得變動相同，比較對象間的相對所得並不太改變，相對所得對幸福就未產生什麼影響。然而如果背景相

似的人在跨不同所得組，相對所得的影響就不易論定，例如同班同學畢業 10 年後還在相互比較，有些人在高所得組，有些人在低所得組，上述的所得移轉透過相對所得，使高所得者幸福下降（比較對象所得上升），低所得者幸福上升（比較對象所得下降），整體幸福是上升或下降，端視兩者幸福的變動幅度而定。

幸福研究的文獻雖有討論相對所得對幸福的影響，但少有再延伸至所得重分配對幸福的影響。作者（Tao and Chiu, 2013）倒是有利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進行這樣的分析，在絕對所得與相對所得的考慮下，分析所得重分配對幸福的影響。這裡的相對所得包括三個層面的比較：平行比較、向上比較及向下比較。平行比較是與相同特性的勞工薪資比較，也就是說與同儕比較；向上比較是與較高所得組的比較；向下比較是與較低所得組的比較。該文發現平行比較與向上比較有統計顯著的負效果，也就是自己的相對所得較這些人低，越覺不幸福；向

下比較則為統計上不顯著。這暗示臺灣人的不幸福大半來自「比上不足」，可惜沒有「比下有餘」，否則我們的幸福感可能高些。如果利用這樣的結果進行所得成長後的重分配模擬，分配越有利於貧窮者，社會整體幸福增加越多。

特別的是，如果也將向下比較的效果考慮進來，所有模擬的所得成長都是降低整體幸福，這是因為即使貧窮者所得提高，也會讓其他人的相對所得較原來低，造成他們的幸福下降，幸好這應該不是臺灣的情況。各國情況很可能依國情而不一，例如 Alesnia et al.（2004）發現所得分配不均對歐洲人幸福感的下降可能較美國來得高，他們認為這是因為美國人以為他們的社會階層流動較快速，所得不均反而反映了機會與努力的獎勵。歐美兩地的差異也說明了為何歐洲的社會福利支出高於美國。

參、臺灣的幸福與所得關係

最後，本節以臺灣的資料呈現幸福與所得的關係，早期

並無幸福的調查，1994 年後「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才不定期開始對幸福（快樂）調查，臺灣 1994 年後實質每人 GDP 仍穩定成長，但平均幸福已呈穩定（下頁圖 2）。不過這項調查的快樂選項各年度不一，某些年度僅三個選項：（1）很快樂；（2）還算快樂；（3）不太快樂，某些年度又達七個選項。作者須主觀將所有三個以上的選項重新分類為三個選項，因此圖中「穩定」的幸福也可能是選項過少，無法敏感地反映幸福的變化。

肆、結語

對臺灣來說，想要知道臺灣人幸福與所得真實關係的首要條件是建構長期、穩定、足夠敏感及具代表性的幸福調查，這項調查不僅反映臺灣人平均的幸福變化，也可透過這項調查評估政策效果。例如，對特定族群實施的政策效果不易被量化評估，「幸福」感受就是項可考慮的目標變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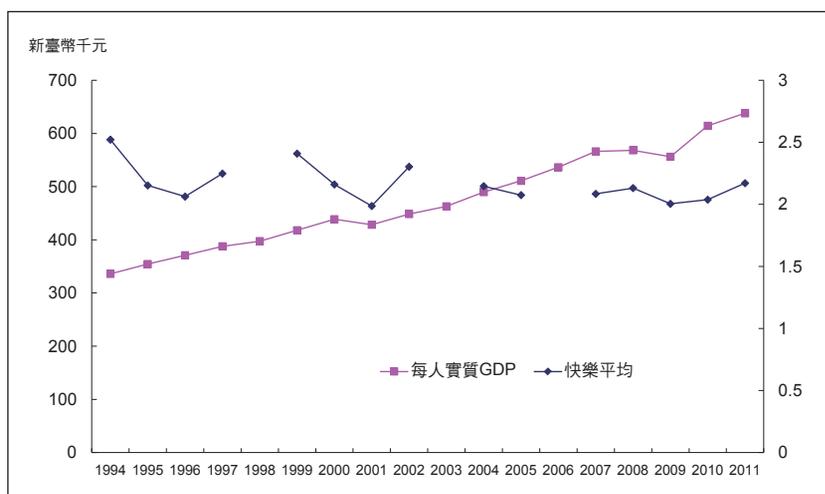
支持伊斯特林矛盾的人最常引用「錢買不到幸福」這句話。如果臺灣人所得與幸福

論述》專論 · 評述

的關係真如圖 2 所示，或已在圖 1 的右方，追求經濟成長不該是首要目標，妥適的重分配也許更可有效提升幸福。例如北歐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區域，也是世界上既富有，所得分配也最平均的區域。又例如奢侈稅可能有害經濟成長，但如果有利於平均幸福提升，而後者才是執政目標，兩者如何抉擇就不難了。其次，物質的追求很可能落入伊斯特林矛盾的陷阱，奚愷元（2006）就建議與其買豪宅，不如將預算用來安排每年定期的旅遊，物質很容易就被適應，精神層面較不易

被適應，政府鼓勵物質的經濟成長，不如鼓勵精神層面的追求。最後，研究已知失業對幸福造成的影響既深且持久，提供穩定就業環境及對失業者的協助應該優先於經濟成長的追求。又例如臺灣勞動市場一直是買方市場，造就了臺灣勞工在世界屬一屬二的長工時，長工時也許有利於經濟成長，但「血汗國家」必然有害於幸福的追求。臺灣的財經政策一直是往經濟成長傾斜，如果成長本身已不太能增進臺灣人的幸福，眼前的財經政策不是應該開始向幸福轉向了嗎？

圖 2 臺灣 1994 至 2011 年之每人實質 GDP 與平均幸福



資料來源：每人實質 GDP（2006 年為基期）利用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計算及平均幸福利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計算（部分年度未調查）。

參考文獻

1. 奚愷元（2006）。別當正常的傻瓜：教你如何明智做決策，臺北市：久石文化。
2. Alesina, A., Rafael Di Tella, & Robert MacCulloch（2004），“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2009-42.
3. Blanch flower, D. G., & Oswald, A. J.（2004）。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1359-1386.
4. Clark, A. E., Frijters, P., & Shields, M. A.（2008a）。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5-144.
5. Clark, A. E., Diener, E., Georgellis, Y., & Lucas, R. E.（2008b）。Lags And Leads in Life Satisfaction: a Test of the Baseline Hypothesi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8（529），F222-F243.
6. Di Tella, R., MacCulloch, R. J., & Oswald, A. J.（2001）。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335-341.

7. Di Tella, R., & MacCulloch, R. (2006). Some uses of happiness data in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1), 25-46.
8. Di Tella, R., Haisken-De New, J., & MacCulloch, R. (2010). Happiness adaptation to income and to status in an individual pane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6 (3), 834-852.
9.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125.
10. Easterlin, R. A.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7 (1), 35-47.
11. Easterlin, R. A.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 (473), 465-484.
12. Easterlin, R. A., McVey, L. A., Switek, M., Sawangfa, O., & Zweig, J. S. (2010).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 *PNAS*, 107 (52), 22463-22468.
13. Ferrer-i-Carbonell, A. (2005).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5), 997-1019.
14. Layard, R., Mayraz, G., & Nickell, S. (2008).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8), 1846-1857.
15. Lucas, R. E., Clark, A. E., Georgellis, Y., & Diener, E. (2004). Unemployment alters the set point for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1), 8-13.
16. McBride, M. (2001). Relative-income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ross-s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5 (3), 251-278.
17. Oswald, A. J., & Powdthavee, N. (2008). Does happiness adap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isability with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sts and judg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5), 1061-1077.
18. Powdthavee, N. (2010). How much does money really matter? Estimating the causal effects of income on happiness. *Empirical Economics*, 39 (1), 77-92.
19. Stevenson, B., & Wolfers, J. (2008).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 Tao, H. L., & Chiu, S. Y. (2013). Income growth, redistribu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aiwan—a simulation study. *Applied Economics*, 45 (6), 775-791.
21. Van Praag, B., & Baarsma, B. E. (2005). Using Happiness Surveys to Value Intangibles: The Case of Airport Noise*. *The Economic Journal*, 115 (500), 224-246.
22. Van Herwaarden, F., Kapteyn, A., & Van Praag, B. (1977). Twelve thousand individual welfare functions: A comparison of six samples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9 (3), 283-300.

註釋

1. 這種心理適應在心理或經濟學研究上又稱「幸福跑步機模型」(Hedonic Treadmill Model)或「幸福定點」(happiness set point)或「基線假說」(baseline hypothesis)。此理論認為一個人終其一生的幸福感受其實不太有變化，外在發生的好壞事或許短暫影響幸福感，但最終還是回到定點或基線，就像一個人不管多努力的在跑步機上跑，他還是留在原地上，沒有任何改變。換言之，這類理論認為每個人的幸福感受大半來自天生。此類的研究多以意外或疾病造成身體不便(如殘障)(Oswald and Powdthavee, 2008)，或結婚、離婚、喪偶、為人父母、失業等重大人生事件來檢驗(Clark et al., 2008b)。❖